

朝鲜李朝实学派文学观念研究

李 岩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序 言

郑 判 龙

实学派是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朝鲜封建社会末期出现的思想流派,是壬辰、丙子事件以后的产物。它集经济、哲学、政治、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于一身,是具有多维层次而内含丰富的思想、文学流派。对它的文学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无论对其整个思想体系的把握,还是对其文学成果本身的探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过去,国内外学者对朝鲜实学派文学及其文学观念有所研究,但是,涉猎范围极其有限,并存在简单化、单一化、表面化和不够全面的弱点,更看不见对其文学观念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专门著作。李岩同志根据朝鲜实学派文学观念研究中的诸多实际问题,既尊重前人成果,也发扬实事求是、力争探新的学术精神,对朝鲜实学派文学观念进行了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

关于本论文的实际目的和意义,作者在“导论”中说道:“在这里,我们的考虑范围不光是一个局部细节问题,而且是一个更丰富的整体系统问题,是在曲线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一系统特殊的新质问题。”“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起步,力图解决至今在实学派文学观念研究中的实际问题,并力图构成一种一以贯之的系统,以便从总体上把握实学派的文学观念,从而进一步阐明它从局部到整体的特征和历史地位及其意义,以求得对实学派文学

观念更深刻、正确和全面的认识。”作者大胆引进系统论的方法，并与先前的历史分析方法相结合，紧紧抓住它既是思想流派，又是文学流派的特点，展现了实学派文学观念内部的深层结构和从总体到局部的各种特征，基本上实现了上述目标。这是这篇论文具有相应的学术水平的第一要因。

李岩同志的论文，于1992年6月通过答辩，作者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充分肯定了本论文在研究实学派文学观念中所取得的成果，指出：“该论文论点新颖，材料翔实，分析精辟，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具有很高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对于答辩中指出的某些不足或缺，作者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当然，研究本身将不断深入。

要成为一个诚实的学者和学术上的强者，不仅需要广博的知识和科学的方法，更需要一股敢于冲破旧框框，奋斗不息的追求精神。李岩同志就是具备这种知识和精神的学者。李岩同志毕业于延边大学，学生时期，他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一九八七年被录取为第一批我国朝鲜文学的博士生。研究课题确定后，他为完成这篇论文，走访国内学者，专程去韩国收集有关资料，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研究期间，他写出了数篇有关课题的论文，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博得了有关学者的好评。这些研究成果是和他的不断的追求奋斗精神分不开的。

我希望李岩同志的这篇论文能给读者以有益的启示。

1993年9月于延边大学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实学派文学观念产生发展的思想文化基础	9
第一节 李朝后期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和发展	9
第二节 李朝后期社会风尚的转变	14
第三节 李朝后期严酷的思想禁锢与理学的衰微	18
第四节 科学精神的抬头与传统观念的转变	22
第五节 实学派文人对传统思想的悖逆与对人的肯定	31
第二章 实学派文学观念的形成	37
第一节 实学派产生以前的文学观念	37
第二节 实学派文学观念的形成	53
第三节 前期实学派在文学观念上对权威的否定和批判	65
第三章 实学派文学观念的发展与成熟	81
第一节 中期实学派对文学情感理论的发展	82
第二节 “寓教于乐”的文学致用观	98
第三节 中期实学派对文学创新和民族个性的倡导	107
第四节 《大东风谣序》对民间文学自然本色之美的张扬	120

第五节 中期实学派的文体改革主张·····	129
第四章 朴趾源在实学派文学观念发展中的重大贡献·····	139
第一节 文学致用观上的新认识·····	140
第二节 对文学真实性原则的独特见解·····	153
第三节 从“法古而知变”到“创新而善变”·····	164
第四节 形式革新观·····	176
第五章 后期实学派文学观念的新特点·····	191
第一节 丁若镛“有补于本民国之务”的文学实用观·····	193
第二节 金正喜的“必以格调裁整性灵”说·····	217
第三节 崔汉绮的文艺反映“今之运化之气”说·····	224
第六章 实学派文学观念在朝鲜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233
第一节 实学派文学观念对中国文学观念的继承和发展 ·····	233
第二节 实学派文学观念与同时期其他文学观念之比较 ·····	254
第三节 实学派文学观念的早期启蒙性质·····	264
第四节 实学派文学观念的总评价·····	275
主要引用及参考文献·····	289

导 论

李朝后半期的实学派所倡导和推动的实学思潮，是朝鲜“近代黎明前”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出现的特殊的思想文化形态，它的文学观念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整个实学思潮洪流中的一个子系统，他们的文学观念感应着时代脉搏，反映着他们变革社会的精神和文学自身的规律，为开辟文学新的疆土草路蓝缕，惨淡经营，特立于朝鲜文学史上又一高峰。

朝鲜的封建社会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发展道路，到李朝后期发生了重大的新的变化。这一时期是朝鲜封建社会开始走向没落，资本主义萌芽逐渐发生并迅速发展的转折时期，在社会经济和思想意识领域内，从极端落后和僵化的氛围中出现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新因素，表现出与以往任何时期显著不同的新的特点。实学派就是这“万籟求变”的社会历史转折时期的产物和推动者，他们的文学观念正反映着这一剧变的时代潮流和新的社会审美要求而出现在文坛上，它影响和推动整个李朝后期文学的发展。在实学派文人们所留下的文学观念遗产中；我们可以发现，那极其丰富而精深的各种文艺见解，不仅与当时的时代精神密切相关，而且具有与众不同的鲜明的新的特征。他们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差不多对文学的各个重要方面都有许多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他们不仅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文学“外部规律”方面的诸问题，对文学“内部规律”方面的诸问题，也有十分具体而生动的探讨和分析，尤其是对文艺创作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从总结实际创作

经验出发，作出了重要的理论概括。同时，他们的文学观念有力地配合他们整个实学思想的发展，以崭新的审美理想，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反对封建传统观念和思想禁锢的束缚，争取个性解放和自由的时代精神，为苦闷、彷徨中的李朝后期文学注入了新的因素，揭示了新的方向，为使朝鲜古代文学跨入近代文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正因为实学派文学观念在朝鲜文学史上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和历史作用，对它的研究一向得到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对实学派文学观念的研究，是随着整个实学派文学研究的发展而逐渐延伸和深化的。本世纪初，洪弼周、涉猎小、李能和、申采浩、郑寅普、崔南善等学者，已深深感到研究实学派文学的重要性，收集整理了许多重要资料，并写出了一些较有分量的论著，作出了开拓性的研究。三四十年代，对实学派文学的研究进一步活跃起来，特别是有关朴趾源的研究，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所提高。如金台俊的《朝鲜小说史》（1932）、权德奎的《评朴燕岩的〈许生传〉》（1939），金锡亨的《朴燕岩与〈热河日记〉》（1941）、李升圭的《朴趾源》（1948）等论著，对朴趾源的文学成果做了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从而把实学派文学研究引向新的阶段。进入五十年代以后，实学派文学研究有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在先辈学者的辛勤努力下，各类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全面展开，各种研究论著、史料相继问世。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实学派文学观念的研究在整个实学派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出现了洪起文的《朴燕岩的艺术与思想》（1937）、金圣七的《思想革命家的燕岩朴趾源》（1948）等专题论文，深刻地分析实学派泰斗朴趾源的文学观念中进步的美学见解。到五六十年代，学者们对实学派的文学观念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讨，如金一根的《朴燕岩的汉诗观》（1960）、《燕岩小说的近代性格》（1956）、金河明的《燕

岩朴趾源》(1955)、崔益汉的《燕岩朴趾源研究》、李钟出的《实学的抬头与国文学思潮的变迁》(1958)、李家源的《燕岩朴趾源论》(1958)、李朝实学派小说研究》(1962)、柳影点的《实学派的文学》(1963)等论文,从不同角度主要对朴趾源文学观念中的近代因素和丁若镛的进步文学观进行了独特的论述。七八十年代可以说是在实学派文学观念研究上有所突破的时期,其特点主要是研究领域的扩大和研究内容的深化。人们在继续深入研究朴趾源、丁若镛两位实学巨擘的文学观念的同时,把研究视野进一步扩展开去,对实学派其他文人如许筠,李瀼、洪大容、“四家”、崔汉绮等人的文学观念也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如张德顺的《许筠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1974)、金龙德的《李瀼的文学观念》(1975)、柳基龙的《湛轩洪大容的思想与文学观》(1976)、宋载邵的《朴齐家的文学观》(1980)、金泳的《清脾录的诗批评样相》(1983)、林荧泽的《十八世纪艺术史的视觉》(1983)、赵东一的《崔汉绮》(1982)、洪文杓的《实学思想的发展与国文学的近代化过程》等专题论文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部分。这些论文都从不同的侧面对实学派文人的文学观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为国内外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外,一些《朝鲜文学史》专著和教科书也对实学派的文学观念作了一定的论述,这对实学派的文学创作与文学观念内在联系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尽管如此,对实学派文学观念的研究还很难说是已经达到了令人满意的地步。与创作相比,对它的研究还是有待继续拓展的一个薄弱环节。至今为止,在实学派文学观念的研究中尚存在着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对一些重要人物如朴趾源、丁若镛等人文学观念的研究比较多,对其他实学派人物文学观念的研究则少。实学派是一个存

续时间长达两个多世纪，又拥有许多大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思想、文学流派。从李睟光的开路先锋到崔汉绮的哲学总结，其间师友传授，绵延不断。在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重要的代表人物活跃在文坛，为实学派文学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深入研究他们的文学观念，无论从局部还是从整体上都有重要意义，应该得到进一步的重视。

2. 单项研究比较多，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研究却很少。从实际情况来看，实学派对文艺问题的看法或观念很少以有体系的论著来表达，大都是比较分散而带有语录性质的论辩或表述，但这并不意味着实学派文学观念遗产没有体系和特点。其实，实学派文学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有明显的自身脉络的整体系统，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是我们更好地把握和总结实学派文学观念局部和整体特征的良好途径。

3. 表面、简单的研究比较多，多角度的立体化的深层研究显得不足。实学派的文学观念是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社会因素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虽然，过去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但在广度和深度上，诸种社会因素对它具体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内在衔接与流变所起的作用研究得还不够。

4. 孤立的研究比较多，与国内外前人文学观念的继承关系中的历史性研究则显得不够。过去的一些论文在这方面也作了一些尝试性的论述，但仍有较大的不足。

5. 在实学派的文学观念研究上，至今还没形成对整体特征作以一贯之的、自成体系的系统研究的专门著作。

任何“观念”都是主体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它是在客观事物的作用下主体思维活动的结果。本文所谈的实学派文学观念，也就是专指特定的主体群——实学派对文学的看法和思想，是他们

文学实践的产物，也是他们文学经验的积累和归纳的概念形态。它将既包括实学派文人围绕文学问题进行的理论批评成果，并兼及他们创作实践中表现出的创作精神、意识，即如他们所进行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等活动和创作倾向、创作方法，以及能够反映他们对文学的看法和思想的一切文学活动，都将成为本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研究范围的这种设定，将有助于我们根据当时社会历史的实际状况和实学派思想、文学活动的具体实情，说明它们在文学观念上发现的具有独特意义的真理性。我们的出发点只是要严格从实学派这一特殊的个体出发，从它的特性出发，着眼于突现它的文学观念的实际变化发展面貌，正确地归纳和规定出它的独特真理性、独立价值和意义。

诚然，实学派文学是朝鲜李朝后期产生的实学思潮的直接产物，是它的一个重要侧面。如果说实学派文学是整个实学思想中的一个系统，那么他们的文学观就是他们整个文学网络中的一个子系统。事物的任何一种系统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与世间诸多要素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便是它最基本的存在形式。观念、思想、人们的一切精神交往，不仅是诸种“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而且更是“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我们首先要把实学派文学观作为一个要素，放到一定系统的各种关系中去进行研究，以揭示其固有的原生质和诸种关系中的系统新质，然后逐层分析这一子系统新质的内部结构，准确地揭示各层结构的性质以及“诸种关系”在文学观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以界定其更高的规律性层次和整个文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过去关于实学派文学观念的研究，始终未曾把影响它的诸种要素纳入自己的研究系统中，没有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系统来对待。那些对个别作家文学观平面的局部研究和在创作研究中只是把文学观当作标签罗列在文章前半部的研究方法，乃是割裂文学

观和影响它、构成它的诸种因素，与创作有机的辩证关系相游离的文学研究中的二元观的表现。当然，决不是说这类研究毫无意义，它对在某种程度上揭示某一个作家的文学世界，有一定的启发性意义，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作家创作的因果关系。我们要说的是，这种研究方法以此规定该作家创作的因果关系，而相对忽略了他们在自身宏观体系中的个性特征的分析 and 研究。固然，文学观和文学创作有密切的关系，特定的文学观要求特定的文学创作，而特定的文学创作需要特定的文学理论的指导，并又启发和加强特定文学观念的实际内容。因此，文学观研究系统应该能够带动并组织起文学创作的研究，使它们彼此主要的诸种特质都从二者的辩证关系中得到适当的说明。当然，我们并不排除一个人文学观和创作实践不一致的现象，如李朝中期的李滉从道学家的文学观出发否定文学的独立意义，认为“文章害道”，但在平时生活中他却酷爱诗，并创作了不少诗歌，以抒发自己的感怀。

许多文献表明，实学一词发源于中国，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根据时代的推移产生了不同的含义（参见韩祐欣《关于李朝实学概念》和全海宗《实学的概念》等文）。本书将涉及的“实学派文学观”中的“实学派”即指壬辰、丙子战争后在朝鲜李朝封建社会的各种机制已经处于停滞、倒退状态，务实气氛和对传统文化的反省精神、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冲击方兴未艾的时候逐渐产生的以改革时弊，振兴封建国家为目的，反对儒家空谈、主张通过研究实际事物来探求真理的学术流派。它的时间上起十七世纪初叶，下限为十九世纪上半叶。我们的研究对象就是该学派文学观的整体系统。我们不仅要研究诸种要素的横向的影响、催化关系，而且还要研究流变过程中的纵向的因果衔接关系。“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

变。”实学派的文学观就是如此，它是一个动态结构。它随着社会时代环境的变化，文人学者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发展，它的曲折的发展道路还直接间接与思维主体所受教育、所学的理论，学派的师承关系，外来影响等有关。这些都将成为我们研究这个系统时所考察的对象。

诸多前辈学者在朝鲜李朝后期实学派文学观的研究上已经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一系列局部问题上比较细致、客观地发掘了可能发掘的思想内涵，但我们不应满足于此种程度的研究现状，把自己限制在既有的研究圈内。在这里，我们的考虑范围不光是一个局部细节问题，而且是一个更丰富的整体系统问题，是在曲线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一系统特殊的新质问题。我们认为，如果不对实学派文学观整体系统进行深入研究，不但会影响对它本身的独立价值和意义作准确的评价，而且会影响对整个实学派文学乃至整个朝鲜古典文学发展史的全面深入的研究，再则还会影响对受它巨大影响的庶民文学、近代文学的正确把握。

总之，本文在前人研究的主要成果的基础上起步，力图解决至今在实学派文学观念研究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并力图构成一种一以贯之的系统，以便从总体上把握实学派的文学观念，从而进一步阐明它从局部到整体的特征和历史地位及其意义，以求得对实学派文学观念更深刻、正确和全面的认识。

全文共六章：第一章是实学派文学观念产生的主客观基础，主要阐述实学派文学观念赖以形成和发展的主客观原因，如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状况以及实学派文人的哲学、文化观念和对中国、西方先进文化的吸收意识、对传统的反省精神等。第二章是实学派文学观念的形成，试图勾勒出实学派文学观念具体形成的历史过程，以及在形成过程的初期实学派文学观念的基本特征。第三章是实学派文学观念的发展与成熟，着力论述实学派

文学观念在其发展成熟期中所展现的各种文学观念的飞跃新质和中期实学派文学观念的基本特征。第四章是朴趾源在实学派文学观念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贡献，着重探讨作为整个实学派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的朴趾源对文学本质特征的一系列新的认识，和他如何把实学派的现实主义的民族文学观念推向成熟的过程，以及他在整个实学派文学观念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第五章是后期实学派文学观念新特征及实学派文学观念的衰微。第六章是实学派文学观念的历史评价，对实学派文学观念的性质、历史地位、影响的总括论述。

实学派在朝鲜历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文学流派。对它的文学观念的研究，不论在对它的整个思想体系的探讨上，还是在对其整个创作领域的研究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实学派文学观念）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自我系统，笔者深感要全面、系统地把握它，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它不是一两个人所能完成的。文学研究是一个无限发展的链条，实学派文学观念的研究是一个有长远发展前途的领域，任何一个研究系统都不可能是这个研究的终点，而必定是这个研究中的一个链条和基石。笔者甘愿当这一个链条和基石，甘愿学步于探索。

第一章 实学派文学观念产生发展的思想文化基础

第一节 李朝后期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和发展

在李朝，历时七年的壬辰战争是一件历史性的重大事变，它不仅斩断了日本侵略者的魔爪，而且大大增强了朝鲜人民的爱国自尊心和民族自主意识。但是另一方面，它使战前本来就很脆弱的国力更加虚弱，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饥饿和瘟疫夺去了无数生命，使千百万人家妻离子散，人口大减，以至“自凤山至京城一带道路，荡无人烟，往来公差及商贾行旅，亦无过宿之地”（《宣祖实录》三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耕地面积也惊人地减少，全国将近百分之七十的土地荒废，出现了“田野未尽辟，污莱榛莽，满目萧然，田亩阡陌，无迹可据”（《同上，三十六年月己亥》）的景象。面对这一严酷的现实，腐败的李朝统治集团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改善政策，反而为维护其统治更加强了对人民的剥削，尽管广大劳动人民克服重重困难，经过一段时期的艰难劳动，重新开垦了王国大部分土地，但在两班、地主、官僚的土地兼并和封建政府的残酷剥削下，仍然无法休养生息。尽管全国“饿殍遍野，白骨如山”，但中央统治集团内部为争权夺利的党争愈演愈烈。如果说壬辰战争的起因是李氏王朝的政治紊乱、经济极度的落后和国防上的麻痹，使异民族视为软弱可欺造成的，那么战后统治阶级应该

好好吸取教训，整顿纪纲，发展经济，加强国防，以防万一。十六世纪后半叶开始的东人与西人两派的党争，到宣祖二十四年（1591），又在东人派内部分裂成南人和北人两派，宣祖三十四年，北人派打败南人派掌权，不久北人派又分裂为大北和小北。1609年大北派策划光海君登基成功后控制朝政，光海君十五年（1624），在野的西人派又发动武力政变，驱逐大北派拥立仁祖。即所谓“仁祖反正”。次年西人派内部又发生矛盾，出现了李适的叛乱。在无休止的党争中，不管哪一派掌权，对内都没有进行过改革，反而助长了无数弊端，对外同样无任何防备措施，贻误了医治壬辰战争创伤的时机，把王朝政治、经济、军事推向了更严重的危机，结果招致了又一次巨大灾难性的外患——丙子战争。在战争过程中，预先毫无准备的李朝政权处处陷入被动，损失惨重。1637年一月，仁祖在后金再次大举入侵时投降称臣。女真人的几次入侵和国内统治者的残酷掠夺，使社会生产遭受极严重的破坏。

1650年孝宗登位，积极任用金瑬等实学派人物和爱国人士，采取了一系列的除弊政策，使社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随着社会安定局面的持续，全国大兴水利，扩大耕地面积，改进耕作技术，这大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官方奖励商业性农业的发展，给手工业和商品货币经济以很大的刺激。这时期手工业发展的显著特点是官营手工业的衰弱和民间个体手工业的迅速兴盛。由于官方放宽了对手工业的身役制，手工业工人得到了发展私营经济的自由，不少规模较大的专业性手工业取得了很大发展。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产品流通也相应地得到发展。特别是肃宗年间（1675—1721）全面废除了对集市贸易的禁压政策，集市贸易从而有了显著发展。据柳馨远的《潘溪随录》记载，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各州、郡、县重要村镇都有五日集市，不仅农民常到这里做买卖，客主、旅客、居间、高

利贷者也在其间做交易。十七世纪后半叶以后，对外贸易也有了很大发展。北关的会宁开市和庆源开市以及中国凤凰城的栅门后市非常活跃，中朝两国的商人在这些地方大量进行贸易。1609年《己酉条约》以后，朝日贸易也积极开展，在釜山、东莱、汉城等地规模较大地进行了公私贸易。十七世纪后半叶至十八世纪初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个体商业的资本积累，对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给予积极影响。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也逐渐增长。据《李朝实录》记载，到1717年，全国人口从1675年的470多万增加到690多万人。

到十八世纪中叶以后的英祖和正祖统治时期，曾一度出现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状况，即所谓“英正盛世”。但封建阶级内部矛盾和统治集团的急剧转向腐败，却把社会拖入更严重的危机之中。首先，这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更加深化。这时期党争的主要特征是党派的细分化和阴谋的公开化以及争夺的残忍化。各个派系的两班统治者为了争夺权利，公开撕掉以前“大义名分”、“礼论”、“道德义理”的旗号，用武力互相残杀甚至杀父灭亲。英祖实行“荡平策”，但毫无效果。针对党争的本质，李瀾一针见血地指出：“朋党生于争斗，争斗生于利害。利害切，其党深；利害久，其党固。势使然也。”（《星湖僊说·朋党论》）腐败的中央和地方的统治阶级，为了满足奢侈的享乐生活，公开贪污国库，搜刮民产，使“国库半空，民陷困顿”。为了弥补损失，统治阶级更加重对人民的盘剥。大批人民不堪官租私债的重压，流为浮客，或亡命山泽，以至聚结举义。全国各地民变、兵变和大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相继不绝。

值得注意的是，十七世纪后半期以后，随着商品货币关系在农村的渗透，利用经济手段，即用金钱廉价收买破产农民土地的办法，逐步成为掠夺土地的主要手段。这时期官房田、衙门田的

恶性膨胀，严重触犯了封建政府的利益。为了限制宫廷贵族和各级衙门对土地的无限扩大，封建政府实行了“级价买土制”，即由政府支出相当于地价的银两，贷给宫廷贵族和衙门，按银两数购买所需的土地。但他们收买土地实际上是以合法买卖之名，行公开掠夺之实，结果更加助长了兼并土地的欲望。这时官僚、两班地主也不示弱，仅开城商人就收买了几乎整个长湍郡松西面和京畿道、黄海道的大片土地。这些都是当时迅速发展商品货币经济渗透到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产物，它促进了土地的商品化，加速了少数人垄断土地的步伐。这在政治上反映了李朝封建统治体制的紊乱和衰弱以及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封建依附关系随之削弱，两者间经济关系却逐渐增多，为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逐步瓦解准备了条件。

宫廷贵族和官僚地主以及商人无限度的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农民丧失土地。少地和无地的农民急剧增加；他们变成半自耕农或佃农。佃农向地主交纳定额米谷租或货币租。在此种条件下的地主与农民，不再是身份上的隶属关系，而只是一种经济关系。这是土地的商品化给身份制领域带来的一场深刻的社会裂变。失去土地的农民，大部分背井离乡，形成为数众多的游民群。李穡在《流民还集》一文中说：“近闻在峡流丐群聚，上命赐衣赐米，使近侍领归乡土，既出城门一倡而众和，齐号而奔散，不可禁。盖以归为不如行乞也。又闻有全邑空者，选其最，命近侍带银錠往而安集，无所事而复。命云：然都市米价极贱，知其谷之尚有所积也，益觉罪岁之非其实。贫者言曰：‘米贱反仇，米贱钱益难得，阻饥尤甚。财货上流，民产既竭，使有丰登，其患依旧在耳。’国家轸恤忧勤，可谓至矣，势到如此亦将奈何。彼散之四方饥冻顿仆其生命者，无几其佣寄偷安。乡念已断，骨肉不存，邻比皆空，亦何心而苟归乎。”（《僊说》卷十四）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领